

## 中国乌孜别克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336481>

赵静

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  
西北民族大学

[liviashao04031018@163.com](mailto:liviashao04031018@163.com)

**摘要:** 乌孜别克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随着兴边富民行动的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化，学术界对于乌孜别克族的研究，关注度更高。文章梳理了近年来学术界从人口文化构成、史学研究、经商传统及城市化、语言使用等方面对中国乌孜别克族的研究成果，基于此，试图探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乌孜别克族的发展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助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合作方面能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一带一路”建设

### 一、人口及人口的文化构成

(一)人口。乌孜别克族，是从中亚迁入我国的民族，也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因其人口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被称为“城市民族”<sup>[1]</sup>。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统计，现有人口12742人。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中90%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少数人口居住在农村或牧区。主要分布在南疆的喀什、和田、莎车、叶城等地；北疆的乌鲁木齐、伊宁、木垒、奇台等地。在城市的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或散居，牧区的乌孜别克族大多与哈萨克族杂居。乌孜别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甘肃的西部裕固语、青海的撒拉语等属于同一个语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与中华各民族产生了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二)人口的文化构成。人口的文化构成是指人口中受各种文化教育者的数量和比重，它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教育普及和发达程度，是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sup>[2]</sup>乌孜别克族有着重视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乌孜别克族71.2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由于城镇化程度高，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文化教育普及较早，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是中国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之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巴哈尔在《新疆乌孜别克族人口的文化构成特点》一文中，依据人口普查资料及数据，对新疆各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每万人口中大学、高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分别为937人、1846人、2545人和3385人<sup>[3]</sup>。与1982年相比，各类文化程度人口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2.95倍。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573人，占5.44%，高于新疆全疆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0.85和3.12个百分点；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560人，占5.31%，高于新疆全疆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3.7和4.2个百分点，高于汉族3.03个百分点。与全疆各民族比较，乌孜别克族人口文化素质在全疆各民族中是较高的。从民族自身发展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水平提高较快。2000年乌孜别克族有文化人口比1982年提高了17.37个百分点，比1990年提高了7.06个百分点。乌孜别克族每万人中各类文化程度人口

的拥有量，在全疆各民族中也是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每万人口中拥有各类文化程度人口为8713人，比全疆平均水平多436人，比全疆少数民族平均水平多708人。其中每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文化程度人口为937人，高出全疆平均水平424人；高出少数民族平均水平663人，比全疆平均水平高2.5倍，比少数民族平均水平高3倍多<sup>[4]</sup>。乌孜别克族文盲人口比重较低，不仅低于7.72%的全疆平均水平，更低于8.72%的少数民族平均水平。

乌孜别克族在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在业人口的17.57%。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在业人口比例分别高于全疆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9.52和13.18个百分点。脑力劳动者比重为34.51%，是全疆平均水平14.31%的2.41倍，是少数民族平均水平6.07%的3.66倍<sup>[5]</sup>。

综上所述，非农业人口多、城镇化程度高、重视教育的传统等方面因素是形成乌孜别克族人口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的根本原因。

## 二、史学研究

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乌孜别克族的研究始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少数民族大调查，为研究乌孜别克族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sup>[6]</sup>。20世纪50至60年代，乌孜别克族的史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主要是简史简志合编和调查史料。资料的采集多来源于传说，文献史料运用较少，研究方法较为简单，研究内容单一。1958年9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赴各地进行调查的通知》，确定新疆地区要完成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满、蒙古、塔吉克、塔塔尔、达斡尔等11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塔吉克、塔塔尔等7个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工作。随后调查组“在乌孜别克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收集了各方面的有关材料。”<sup>[7]</sup>在民族识别、民族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63年编写了《乌孜别克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是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乌孜别克族历史的史书，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至今，乌孜别克族史学发展迅速，史学成果大量涌现，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颇高的史学专著和研究论文。《乌孜别克族简史》是卡德尔·艾克帕尔（乌孜别克族）用维吾尔文撰写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办公室审定，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参考的是《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文库之三概览编》<sup>[8]</sup>。《简史》搜集了丰富的史料，加重了对乌孜别克族建国前的历史的叙述，“第一章通过大量的史料介绍了乌孜别克族古代先民活动的地域、乌孜别克族的形成”<sup>[9]</sup>。罗建生的《乌孜别克族》，采用章节体对乌孜别克族的族源族称、历史、生活习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情况作了介绍。<sup>[10]</sup>赵小刚的《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sup>[11]</sup>，从社会演进、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论述了现代乌孜别克族与其他民族互动交往的关系，为研究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阿利亚·吉力力的《乌孜别克族新疆木垒县阿克喀巴克村调查》，将研究视角放在阿克喀巴克村，通过一个点的研究折射出新时期新疆乌孜别克族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变化。另有专题性研究论文：《新疆乌孜别克族民间信仰研究》《乌孜别克族伦理思想概论》等<sup>[12]</sup>。从整体上看，这个阶段对乌孜别克族的研究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研究成果丰富，不仅出现了系统的乌孜别克族史学著作，还涌现出了一批从事乌孜别克族研究的专业科研人员。多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开展研究，研究的内容向专题研究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从单纯的历史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经济文化、伦理思想、社会文化、民间信仰等方面。

## 三、经商传统及城市化

（一）中国的乌孜别克族人口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主要基于该民族自古以来善于经商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从中亚内迁所形成。

自古以来，域外乌孜别克人因经商而大批进入新疆。这一长时期、大规模的商业移民浪潮形成了中国乌孜别克族的主要来源。至今，新疆乌孜别克族的居住格局、经济文化类型、社会行业构成等仍保留着当年移民的影响。据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八年（1364年），撒马尔罕城的东门曾称为“中国门”，该城有一条横贯全城的商业街，每年春季满载货物的中国商人从此门进入<sup>[13]</sup>。在15世纪钦察汗国的首都撒莱，最受欢迎的商品是中国的丝绸。16世纪以后，每个乌孜别克汗王都有铸币权，说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程度。

不论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以商队的形式往来于中亚和新疆之间，还是19世纪末叶以后，从事商业活动的乌孜别克族开始出现了坐商、行商和小商贩的分化。总之，在各个历史时期，乌孜别克族都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当时民间有句谚语：“十个俄罗斯人不如一个犹太人，十个犹太人不如一个乌孜别克人”<sup>[14]</sup>。1921年乌鲁木齐贸易圈内共有俄籍正户101户，附户500多户，附户指乌孜别克等民族<sup>[15]</sup>。

历史上，乌孜别克族手工业也较发达，比较集中和发展的地区是莎车，其中绝大部分是丝织业。据文献记载，清末民初，仅莎车一地就有乌孜别克族的丝织手工作坊200余家，成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但由于丝织手工业的原料收购和产品推销直接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一度兴盛的乌孜别克手工很快便走向衰落。得以保存下来的仅仅是手工刺绣，如小花帽等，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生产性质。

以畜牧业为主或兼营牧业的乌孜别克族人数较少，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木垒、奇台、新源、昭苏、巩留、特克斯、尼勒克、伊宁和塔城等地。从事农业的乌孜别克族，大多分布于南疆的喀什、莎车、巴楚、阿克苏和北疆的伊宁等大城市附近。在与当地维吾尔、哈萨克族人民交往交流中，各民族之间生活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已经逐渐形成了许多彼此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特点。

乌孜别克族在新疆的商业活动奠定了其人口的城乡分布格局。至今，乌孜别克族人口大多散居在伊宁、喀什和乌鲁木齐三大城市。

（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是全国唯一的乌孜别克民族乡，也是一个居住分散、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贫困乡。1981-1985年人均收入一直徘徊在80元左右，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公路，没有一所医院，看病至少要走20公里到<sup>[16]</sup>。木垒县80%以上贫困人口居住在牧区。为使牧民摆脱贫困，木垒县实施了定居搬迁工程。对于牧民而言，移民搬迁是一种经济类型的改变，更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和自我的文化转型与变迁。作为实施搬迁的主体，政府采取了“一打破三统一，四先四后四当年，四通四有四配套的原则”<sup>[17]</sup>。牧民们经历了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过程，并显现出愿意主动适应的迹象。已适应定居模式的牧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开始种植天山白花豆等特色农产品，搞特色养殖等。不少有经济头脑的牧民将眼光投向了赚钱更多的种草行业。他们的身份也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传统的“牧民”。除了农业，一些牧民还将目光投向三产。在政府倡导的定居搬迁中，牧民们没有选择家庭整体搬迁的激进做法，而是采取大家搬到山下务农、小家仍在山上放牧的方式，既保留原有牧业文化传统，又便于适应新的生计方式，这可以看作是牧民对不明朗前途的一种策略性应对。

#### 四、语言使用情况

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情况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语言国情调查是我国语言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sup>[18]</sup>。阿达来提以我国三个乌孜别克族相对聚居的地区，伊宁市、喀什地区和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作为调查点，对乌兹别克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她认为我国乌孜别克族已经基本不使用母语，乌孜别克语不再是乌孜别克族日常工作学习及生活中的交际工具，也已经基本失去家庭内部语言的地位。从乌孜别克语的使用范围、使用人数、使用群体及使用场合等方面说明，在我

国，乌孜别克语已经成为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濒危语言之一。在伊宁和喀什地区的中青年中，主要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在老年人群中，主要使用乌孜别克语和维吾尔语。在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的中青年中，主要使用哈萨克语和汉语。他们能熟练使用哈萨克语，成为了第一语言。那么，探究乌孜别克语言使用多样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形成的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相对固定的互嵌式的居住格局，为语言的转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二是伴随着婚姻观念的转变，乌孜别克族与外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对本族语言的使用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三是乌孜别克族在传教经商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仅对推动我国与中亚及世界各国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基于相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传统观念，在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良好的民族关系，这也是语言发生转用的重要因素<sup>[19]</sup>。

### 五、中国乌孜别克族的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 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3月，国家在“一带一路”规划布局和愿景行动中，正式把新疆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境内段核心区，为新疆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乌孜别克族人口分布最多的新疆，有长达5600公里的边境线，与多个国家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便捷地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交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既是桥头堡又是大后方，并因其独特的地缘文化圈资源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区位支点。新疆众多民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宗教信仰上具有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交融。相似的宗教信仰使得新疆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软实力。在“一带一路”这条以经贸、文化交流为主的国家之间的“时空廊道”中，国家的边疆处于中心。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新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sup>[20]</sup>。而生活在这条绵长边境线上的乌孜别克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在“互嵌”式的居住社区环境中，形成了与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sup>[21]</sup>，形成了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者，国内外的乌孜别克族虽分属不同国家，但他们同根同源，地理毗邻、语言文化相通，宗教信仰相同。这种族群意识维系着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族缘与亲缘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二者的内部认同。这种认同跨越疆域和族际边界，使得国内外的乌孜别克族在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通婚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结。这种深植于亲密关系之中的文化认同，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文化对话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民心相通的基础。必然在实践“一带一路”丰厚内涵、展现“一带一路”积极效应、诠释“丝路精神”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示范作用。新疆与邻国之间“民心相通”的基础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地区高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sup>[22]</sup>，以形成区域乃至全球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从而推动世界新一轮的开放演进为目的。因此，各民族在相互理解、交流互鉴基础上和谐相处，才能促进一带一路目标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愿景的达成。

(三) 新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分享中国社会治理成功经验的前哨站<sup>[23]</sup>。尽管“一带一路”建设聚焦产业、贸易、金融、能源领域，但其所传递的制度、思想与理念绝不仅仅止于经济发展层面。中国诸多关乎社会变革、国计民生的有益探索，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塑社会核心价值、消除贫困落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贯彻发展理念、保护

民族传统文化等，必将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全球共享。基于民族间的密切往来与政府间的频繁交流，民族地区将成为分享中国国家和地方社会治理成功经验的第一线。

（四）同源民族在增进各国政策沟通方面存在显著优势。在这方面，除了发挥政府和外交人员的主体作用外，同源民族也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软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认可和信任。同源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对政策理解透彻，政治素质过硬，大局意识强，在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同源民族“参与式发展”的过程中，既能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展开，又能实现同源民族自身的发展。

（五）重要的成功实践。从“一带一路”构想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全面开启，新疆核心区建设已从构想走入现实，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sup>[24]</sup>，在共商共建共享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历史上有着久远的友好交往的历史，古丝绸之路给中乌两国带来了深厚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这是中乌友好合作、共谋发展的历史基础。2022年9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和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指出，“中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年来，双方在政治、外交、经贸、人文等领域建立起高效协作机制。基于双边合作的高水平，以及两国在共同关心领域进一步开展全面合作的意愿，双方决定进一步深化亲密友好、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新时代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sup>[25]</sup>。

## 六、结语

笔者对中国乌孜别克族的人口文化构成、史学研究、经商传统及城市化、语言使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的阐释。站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化背景下，提出了同源民族及地区在文化传播与共享、中国治理经验输出、经贸往来、构建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凸显的文化功能。“一带一路”建设是对以西方权力话语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纠正，同源民族和所属的地区则以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事实深刻诠释了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为“一带一路”建设向更深层次推进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sup>[1]</sup> 房若愚：《新疆乌孜别克族经商传统与人口城市化》，《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页。

<sup>[2]</sup> 吴忠观：《人口科学辞典》，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1页。

<sup>[3]</sup> 巴哈尔：《新疆乌孜别克族人口的文化构成特点》，《新教师》，2004年第4期，第1页。

<sup>[4]</sup> 巴哈尔：《新疆乌孜别克族人口的文化构成特点》，《新教师》，2004年第4期，第2页。

<sup>[5]</sup> 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sup>[6]</sup> 张京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乌孜别克族史学成就》，《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页。

<sup>[7]</sup>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乌孜别克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出版，1963年。

<sup>[8]</sup> 张养吾：《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文库之三概览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sup>[9]</sup> 张养吾：《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文库之三概览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sup>[10]</sup> 罗建生：《民族知识丛书·乌孜别克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 [11] 赵小刚，《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 [12] 张京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乌孜别克族史学成就》，《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2页。
- [13] 李小刚：《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 [14] 李小刚：《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 [15] 李小刚：《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 [16] 张咏：《牧民定居与文化转型——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定居工程的考察报告》，《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1月，第1页。
- [17] 张咏：《牧民定居与文化转型——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定居工程的考察报告》，《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1月，第2页。
- [18] 戴庆厦：《构建中国多民族语言和谐的几个理论问题》，载《构建多语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17页。
- [19] 阿达来提：《中国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北京，2012年，第1-6页。
- [20]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在新疆考察途中指出：“新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 [21] 2018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讲话。
- [22] 杨荣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战略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兰州，2017年，第58页。
- [23] 李智环，邵媛媛：《论跨境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基于云南的思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页。
- [24] 陈德峰：《“一带一路”倡议在新疆的伟大实践》，《新疆社科论坛》，2017年第4期，第1页。
- [25] 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2022年9月14日至15日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就两国互利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

